

厉彦林的散文选《地气》(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汇集了他的七十篇优美散文,书的装帧设计也很精美大气,与文章交相辉映。而且每篇散文后边都有二维码,微信扫描就可听配乐朗诵,使人耳目一新,也真切感受到高科技的神奇。《地气》中的每篇散文,故事细节、抒情状物、写人绘景都是不尽相同的,但仔细品读之后,都会感触到写在纸上的文字有一种聚元气、有骨气、扬正气的力量,紧贴地气,紧扣时代,直击读者的心灵。

《地气》这本散文集,分为乡情如酒、亲情暖心、真情在胸和家国情深四辑。这些作品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时代脉搏、记录人间变迁、反映发展成就、弘扬真善美,给人以昂扬向上的力量。有的文学创作,很注重个体内心和个体生命的体验,无形中往往忽略了时代主调、家国情怀与人民心声。厉彦林则不同,他说“我愿终生成为一位故乡的歌者”,他立足沂蒙大地,讴歌家乡和乡亲,以此为圆心,延伸至人民甚至人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革命前辈、英雄人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新农村建设等宏大主题都在他文章中留下印记,父母亲人、沂蒙母亲、红嫂群体、蒙山老人、无名烈士,以及沂蒙老山磨、地瓜、煎饼、布鞋、鞋垫、窗花等,都在他的笔下鲜活生动起来,彰显出昂扬向上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和丰腴宝藏,而人民是文学创作的表现主体和最终评判者。厉彦林总是怀着对亲人、对乡亲、对故土的崇拜和敬畏之心,善于将内心的感受、对亲人的真情实感沉淀到化不开的浓度和烈酒般的纯度,读者往往被其真诚、圣洁、善良、美好的感情所打动。当读到《仰望弯腰驼背的娘》《回家吃顿娘做的饭》《舍命保人》等散文时,难免让人情不自禁、泪流满面。《春天住在我的村庄》《享受春雨》《煤油灯》《年夜饺子》《除夕小》《喜鹊窝》《赶年集》等散文所写的事虽然很“小”,却藏着大主题,透出抚慰社会的温度和照耀人心的光芒,是暖心暖肺的情感抒发。此书的序和跋,分别是散文《地气重震》和《天光照耀》,都是从关注“今天天气如何?”入笔,反映着中华文化的天地观、宇宙观,“人们极少感谢土地的养育之恩,土地她不计较,默不作声地养育着所有的人;人们为了一时的利益,肆意破坏着她,她不生气,宽宏大度地养育着所有的人;坏人再怎么恶贯满盈、罪该万死,她也不在乎,毫不偏心地养育着所有的人。这就是土地田野调查法。这本书对于进一步深化数字化时代的文学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系《求是》杂志原总编辑）

雷达作为评论家的意义及其他

□ 梁鸿鹰



2007年8月26日,电影《白鹿原》创作高层论证会在京举行。文学评论家雷达出席会议。

熊海摄 视觉中国/光明图片

雷达在3月的最后一天猝然离世,这位著名文学评论家从星空陨落,一时间引起巨大反响,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长期以来,评论家们的劳动实际上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评论”似乎只属于评论家之外的别人,而与评论家本人无缘。评论家天生就是评论别人的,评论家一般不应得到评论,这些似乎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铁律和常态。雷达为各地无数位作家写过评论,参加过无数次研讨会,为无数位文学新人或文坛名家写过序,在许多作家的成长过程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

用,但评论界对他的评论的评论却很吝嗇,只有他学生辈写过少量文字,在北京也没有为他举办过研讨会。今年3月中旬,凝聚他一生心血的《雷达观潮》出版,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仍然说:出了就出了,现在看来简直就没有什么反响。话说得很悲凉。而随着雷达告别这个世界,一个文坛辛勤劳作身影的消失,一个独特声音的远去,人们才感到一位伟大批评家辞世所造成的空白几乎是难以弥补的。

作为一个卓有建树的理论家和评论家,雷达以深刻的认识和极为宏阔的视野,开辟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他提出的许多命题颇为独到、一针见血,他查找文学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概括抽象出的一些结论,至今仍然不无启发和引领的意义,为当代文学经典化开辟了巨大的可能。2014年,雷达应邀在《文艺报》开办专栏“雷达观潮”,以文学思潮、现象和问题为主要选题,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他研判的深入与思想的敏锐,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比如他提出,关怀人的问题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文学批评平庸言说的“过剩”与富于个性实效性评论的“不足”是大问题,以十年为单元的“代际划分”有可能阻断作者对生活本身的拥抱、体验,文学与新闻的纠缠考验着作家能否再造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想象世界,文学遭遇影视“筛选”的同时也在反改造,有效而有价值的阅读必须得到拯救等等。再比如,他的文学批评有强大的问题意识,他在一个时期里,紧紧围绕文学创作的“症候”,提出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

时代空气,当代文学缺少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作家亟须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力量,作家要拥有精神超越性和生活整体把握的能力,当代文学要把提升原创与遏制复制作为努力方向等等。开设“雷达观潮”的时候,他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健康也面临着诸种问题,但依然要求自己“思想尽量不老”,有锋芒,不可炒冷饭、说套话,尽量提出一些新问题、真问题。在当代文坛普遍缺乏问题意识的时候,他观潮目光如炬,行文沉稳有据,他的跋涉殊为不易,在今天看来犹有意义,不少提醒和警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彰显其意义。

雷达文学评论的突出价值,我想,还在于他对当代文学整体存在的相伴相生相助意义,还在于他作为见证者、参与者、研究者、命名者构成的血脉关系。雷达的文学评论实践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始终关心着文学的现实发展,从没有脱离中国文坛增强,居于“橄榄”的中部,匮乏程度越高膨胀得越厉害,又因满足而减弱,滑向“橄榄”的两端。在多种媒介共同作用下,文学主体的欲望呈现丰富的差异性,并且往往还具有互补性。

以数字化为特色的媒介场域中,文学创作主体的地位、角色、欲求等随着各种媒介的此消彼长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文学创作主体内部产生分化,精英作家、通俗作家、网络写手、段子手等共存于同一个文学创作空间。而不同的文学形式相互渗透,不仅出现影视的文学化,还发生了文学的影像化。身处其中的机械印刷时代的创作主体在走向分裂,在这个新的“读图时代”,创作

主体必须摒弃文学与新媒介对立的二元思维,取长补短,充分发挥主动性和自觉性,创造一种与时代同步的别样的文学形式,坚守和传递以陌生化为特征的文学性。

在日新月异的媒介场中,文学阅读主体的选择更加多样,审美取向更加多元。在多媒体并存的媒介场中,泛媒介文学阅读带来认知模式的变化,目前正处在由深度注意力向过度注意力转变的过程当中。深度注意力是指阅读的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在单一目标之上,忽视外界的刺激。过度注意力的特点是阅读的注意力分散,阅读在多个对象之间不停跳转,对单调沉闷的内容缺乏耐性。赵玉认为,我们不应该对泛媒介阅读持悲观的态度,而应探索和引导文学阅读的新观念。文学阅读必须向影视和网络媒介开放,丰富文学阅读的体验。

呼,他甘当人梯和使者,他是不倦的观潮者。雷达作为民族精神发现与重铸的提倡者,是“新写实”思潮的归纳评述者,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缩略时代”的命名者。2009年,他在《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审美精神》一文中提出,到那个时候为止的三十年当代文学的贯穿性主题,就是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启蒙、先锋、世俗化、日常化是当代文学审美意识变化的关键词。他的那些富于学理的分析与提醒,无不来自对当代文学的细致观察,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历史观点的实践者”,始终表现出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执着坚守之情。

雷达的批评实践在当下的意义,还在于他的品格风范的感召力。作为鲜活文学现场的守望者,雷达永远是平易、亲切的,他是活跃在文学现场有分量的长者,他使用的语言于朴实中有着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从来不曾用于构成对任何一个作家的杀伐与打击,他从不滥用自己的评判力以树立自己的权威。20多年前我曾与雷达在乒乓球台上交锋,他以大我20多岁的年龄,几个回合的抽杀就让我难以招架,这与我印象中的雷达一致。他是永远坚硬、倔强、稳固的,从来不服输、不服老,他的最大个性是不放弃自己的立场与阵地。他也不因为自己受到尊重而动辄妄下断语,或对成长中的作家随便指手画脚。雷达评论中散发出的真诚和善意是面向、属于所有人的,而且他向来反对故弄玄虚、自我浮夸,坚持评论的鲜活性和与人为

善的统一。他的评论以学理见长,但他的写作从不掉书袋,不搞高头讲章。雷达的思想一点都不落伍,但从不在任何时髦理论与风头的后面,只是注目那些变动不居的当代创作,静观审美观念的潮起潮落,把每个作家的成长、进步作为自己的观察对象,不倦地守护文学的生态。与雷达接触久了,你会发现,他有着很强的平民情怀和人文精神。也许是由于他的成长颇多坎坷曲折,他对那些生活在外省、边远地区,于困苦中艰难探索的写作者关怀备至。他出身平民,是一个深具平民眼光的人。他说自己的感觉永远也好不起来,心绪总是沉甸甸的,怀疑自己是这个时代的“逸民”,不愿受别人的追捧与注目。他从来就不肯与贵族化、精英化做派为伍,他曾经担任一个作家村的“村长”,他静静地观察着那些奋斗中的作家的成长,他愿意做当代文学生态的一位平凡守护者。

雷达曾经援引法国作家蒙田的话来阐述自己心目中的好散文,说想要人们在散文中看见平凡、淳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无束亦无造作。研读他的评论,透过那些颇具风格、思想饱满的文字,会被一位批评家睿智、宽厚与真诚的风范所感染。哪里有博大的人格,哪里就有真诚的创造。雷达以自己创造性的评论实践昭示着我们,一个评论家的荣光,属于当下文学的生长,亦当属于文学永远的未来。

（作者系《文艺报》总编辑）

为数字化时代的文学“把脉”

□ 何成洲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新月异的数字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的生产和生存方式。数字化时代,文学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不仅人们的文学阅读习惯和方式不同于以往,书本阅读的比例不断下降,影视和网络影像在渗透和重塑文学阅读,而且文学创作的动机、方式和过程受到数字化大环境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出现分化,有的寄游于网络,有的为影视而创作。面对这波谲云诡的当下文学场景,理论工作者急需提出新问题、新视角和新观念,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文学发展的现状,增强对未来的信心。

在新作《媒介场中基于欲望主体的文学存在方式动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赵玉将社会学中的“媒介场”概念引入

文学研究,将媒介视为与阶级、种族、性别等类似的文学批评新维度,探讨当下数字化时代文学活动的变与不变、新与旧、危机与重生,重塑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特色。当前数字化语境下,多种媒介并存且相互渗透,文学相应地产生种种新变,本书首先从理论层面建构了媒介变迁中不同类型文学主体的欲望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创作主体、阅读主体、批评主体面对媒介的改变而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和措施。

不同的媒介场对应或者构建了差异性的主体及其欲望诉求。每一种媒介都有着符合自身特点的编码规则,满足的主体需求不同,主体也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生成不同的身份特点。媒介场域构建了渴望实现人的多种可能性的欲望主体。相对于马斯洛金字塔式的需要层次

以乡村伦理视角考察乡土小说的“成色”

□ 张凯成

提到乡土小说,“打工文学”“底层写作”“苦难意识”这些标签随之而来。这不仅构成了乡土小说研究的“准则”,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者自身的思维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标签化的思维容易使乡土小说的面目日趋模糊。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乡土小说概念本身的包容性,有着开阔的空间,也因为学界对于研究对象的辨识度不够,导致批评与研究过程中的舆论化、标签化等问题频频出现。于是,乡土小说的研究陷入困境之中,而研究路径的单一是形成困境的主要因素。就乡土小说本身而言,“乡土”概念存在着本体性的局限,即围绕着“乡土”范畴的建构所生成的某种区域限定,而相应的研究方式也局限于既定的视域。倘若一味地为着研究方式层

面的突破,而抛却“乡土”的内在属性,便容易使得研究落入本体性的偏移中。因此,如何在尊重乡土本体的前提下,探究乡土小说研究的创新性路径,成为该领域研究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贺仲明等著《乡村伦理与乡土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乡土小说研究路径的探究层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该书以“乡村伦理与乡土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研究视域,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形成了乡土小说研究的新观念,而且建构出了探索乡土小说写作的有力空间。同时,由于“乡村伦理”这一社会学概念的加入,这部论著在方法上突破了单一的文学研究视域,从而在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中,拓

宽了乡土小说的研究方式。可以说,贺仲明等学者通过审视乡村伦理变迁影响下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写作,有效地突破了当前乡土小说研究的困境。

从概念范畴上说,“乡村伦理”更多地指向社会学空间,尤其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土地伦理”与“人情关系”成为这一概念的主体。当其

需要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关系背后所彰显出的文学、社会学问题。在具体研究中,这部论著恰当地处理了“乡村伦理”与“乡土写作”的对立关系,在摆脱“乡村伦理”的社会学范畴约束的基础上,将其视为参照性的视域空间。这是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写作的文本对象所决定,也与文学自身的表达限度有关——“文学只能是表现、展示,通过曲折而间接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对社会现实产生某些影响,所以,对乡土小说与现实乡村伦理的建设,显然不能给予过多、过于急切的要求,也不能期待作家们提出非常有针对性的、具有现实建设性的思想”。这一限度同时形成了这部论著在研究意识层面所建构的明晰性空间,即这种创新并非是无限度的意识拓展,而是在充分尊重文学研究“边

界”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意识的创新,以确保创新本身的效力。

这部论著以“乡村伦理与乡土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主线,建构出了综合性的研究空间。“乡村伦理”作为社会学空间,其本身包含着诸多复杂要素。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中的“乡村伦理”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乡村伦理影响下的乡土小说自然呈现出复杂的写作样态。作者们充分认识到乡土写作的多样性,通过身份差异、怨恨叙事、女性写作、西部地域等多重维度,来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写作的多元空间。在具体研究中,这部论著针对各个空间维度又进行了细致梳理,比如“进城乡土小说”作家身份的三重划分(“农裔打工作家”“农裔城籍作家”“城裔城籍作家”)、女性乡土伦理叙事的两重主题(“婚姻伦理叙事”“生存伦理叙事”),以及西部乡土作家的三种伦理书写姿态(“苦难伦理情怀”“乡村浪漫情怀”“乡愁感恩情怀”)等,彰显出细致的思维与敏锐的辨别力。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新论辑录

文学走出去的“内力”与“外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2018年第2期刊发穆佳、汪宝荣的论文《麦家〈解密〉在英美的评价与接受——基于英文学界视角的考察》。作者认为,《解密》的译介和传播方式不同于汉语文学经典作品先经典化后译介的模式,也不同于某些当代汉语作品通过影视再创作的成功传播后反哺原著传播。《解密》走红西方有一定的偶然性,尤其表现在译者米欧敏和《解密》的不期而遇上。再是出版社的有力推动。英美两大出版业巨头的联手,借助于出版商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强大的销售网络,《解密》在市场上取得很大的成功。在这种偶然性和外力助推的背后,是作品自身魅力这种内在因素。通过梳理

《解密》的英文书评,可以看出《解密》受到的正面评价主要涉及作品主题内容上善于破解人性密码,并且玄奥学科知识交织。在故事情节和叙事方式上,有浓墨重彩的细节描写,有密码般复杂曲折的情节,还创造性运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手法,同时作家背景与小说主题情节相契合,作品与西方类型小说相关联,并且拥有东方神秘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中国式的爱国情怀等中国元素。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要成功走进西方市场,首先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内力”,尤其作品蕴含的中西共通的世界性元素,其次有赖于文学输出的规模、图书市场的推介力度以及全球化程度等“外力”。